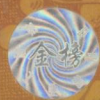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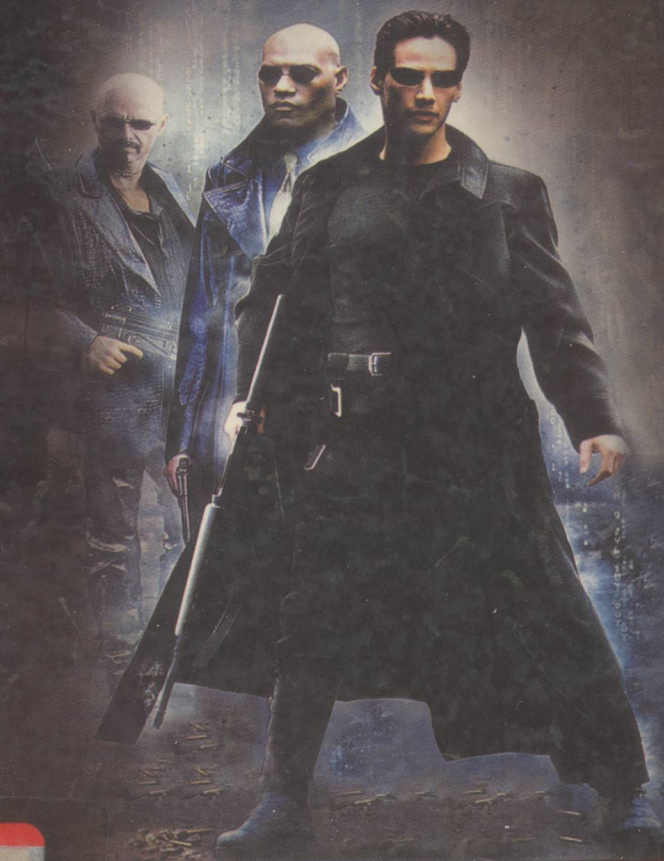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闯入黑社会

(美) 约翰·道格拉斯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闯入黑社会

[美国]约翰·道格拉斯 著

刘小川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闯入黑社会/(美)道格拉斯(Voglach, J.)著;刘
小川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闯… II. ①道…②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
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567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87 字数: 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 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内容简介

我们没有经历野蛮社会的文明，却要经历文明社会的野蛮。

文明是文明者的墓志铭，野蛮是野蛮者的通行证。

犯罪是野蛮的行径，野蛮是罪犯的特征。

有谁目睹凶杀而无动于衷？有谁遭遇强暴而安之若素？

道德鞭挞所有卑鄙的丑恶，法律也必将严惩所有可耻的罪行。

黑社会里的疑案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

一起起凶杀案、强暴案、绑架案，每案都鲜血淋漓。

诡秘恐怖的案情，让人心惊胆战；残忍暴力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

《闯入黑社会》既是一部刑事探案小说，又是一部法律推理小说。案情与推理交叉进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对个案进行透彻入理的剖析，澄清其中的谜团，使复杂的案情简单化。在案件推理上又不惜笔墨，每一案例都有独到的见解，同时对整个刑事司法制度也提出一些颇有价值的看法，使读者对当时当地的法律有所了解，这是其他同类小说望尘莫及的。

书中详细叙述了苏珊娜等几起残忍的凶杀案，深入分析后提出人情入理的解释，典型案例与理论分析紧密结

合，同时洞悉杀人狂魔的内心世界和犯罪动机。他们为何作案？是心理抑郁？还是心理幽闭？从而引发读者去深深思索，思索案情之外的大千世界。

判决已经做出，但黑社会里的故事远未结束。读过《沉默的羔羊》，你是否还心有余悸？领略本书的险情，你的内心也会久久不能平静。

道格拉斯的初衷是写一本反映刑事犯罪案情的好书，但他深邃的洞察力和所掌握资料的说服力，本书已远远超出了对刑事犯罪的描写，他让我们为无辜的受害者感到极度悲伤，对刑事犯罪无比愤怒，并且为保持人类生存环境而苦恼。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这本书成功地描写了许多令人心惊胆战的刑事犯罪故事，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侦探小说，道格拉斯给我们提供了一双慧眼，使我们得以观察那些十分荒诞而残忍的刑事犯罪和刑事罪犯……

——美国《今日美国》书评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第一章

闯荡黑社会

闯
入
黑
社
会

1983年12月初,38岁的我瘫倒在西雅图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当时,我刚接手格林河凶杀案。我从匡蒂科市带来的两名助手不得不撞开门来救我。整整5天,我躺在瑞典医院急救科昏迷不醒,处于死亡边缘。由于同时处理150多件案子,高度紧张劳动,使我患了病毒性脑炎,那150多件案子的破获都等着我的分析意见。

我原以为自己活不了了,但一流的医药治疗、家人的爱和同事的支持竟使我奇迹般地恢复过来。

一个月后,我坐着轮椅回到家里,5月份才去上班。在此期间,我十分担心疾病给我留下的神经受损的隐患会妨碍我按联邦调查局的标准工作,并因此而过早地结束我特工人员的生涯,直到今天,我的身体左侧仍有一些旧伤。

不幸的是,在干我这一行的出现中像我这种情况是屡

见不鲜的。在调查支援科同我一道做形象合成员和犯罪调查分析人员的同事中,多数都因职业关系患有严重的神经紧张或其它疾病,不得不隔一段时间就离开岗位调整一下。他们所患疾病多种多样,有的像我一样患了神经损伤症,有的是胸痛、心衰、溃疡、肠胃功能紊乱、神情焦虑和情绪低落等等。执法官的名声不太好听,所受压力极大。在家做恢复治疗期间,我对我们这项工作想了很多:它能引起不同于其它工作的特别紧张感,这种紧张感甚至大于其他联邦调查局特工、侦探、警官所承受的紧张,尽管这些人直接面临肉体危险的可能比我们大得多。

我想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在一家久以“夫人,只讲事实”为口号的著名机构里,我们是他们唯一时常征求看法的部门。即便如此,在J·埃德加·胡佛逝世之前,形象合成工作甚至不被视为同犯罪斗争的合法工具。罪犯人格分析科在匡蒂科市建立后的许多年里,局里局外的好多人都把这项工作看做是一小撮躲在阴暗地下室巫师所做的巫术或魔法。

尽管,生与死的决定常常都依据我们的建议而做出,我们却难以奢望有什么有力的事实来支持我们,我们也享受不到那种让人一下便黑白分明的快慰。假如警官出了错,那只意味着案子或许不能破获,可事情并不会比原来更糟,而我们被叫去时,案情分析往往已到了最后的一道救助程序,如果我们出了错,则很可能把调查工作引向歧途。所以,我们必须全力确保我们的建议丝毫不错:可我们惯用的手法却是对人的行为分析,而人的行为分析——按精神医生常对我们说的——并非精密科学。

全美及世界许多地方警方和执法机构来找我们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拥有他们所缺乏的经验。就像比一般的医生见过更多罕见病例的医疗专家一样,我们占有从国际国内两种角度看问题的优势,因此,可以注意到被当地调查者忽略了细微差别,而当地调查者往往只能以自己的判断作参考。

我们以人的行为反映人的性格为原则,通常把形象合成的过程分为7步:

1. 分析犯罪行为本身。
2. 综合分析犯罪现场的种种细节。
3. 综合分析受害人的情况。
4. 分析警察所作的最初报告。
5. 分析法医验尸报告。
6. 根据罪犯的关键特征合成形象画面。
7. 依据合成画面提出调查建议。

上述最后一步表明,提供犯罪形象合成往往只是我们提供服务的开始。下一步是咨询当地调查人员,制定迫使潜逃罪犯露面的预先行动方案。此后,我们通常要远离案情,回避一阵子,但即便如此,我们仍有可能卷入调查过程中,这包括与某位被害小孩的家人见面,指导他们怎样对待罪犯描述小孩如何惨死的奚落电话,甚至设法用被害小孩的兄弟姐妹充当诱饵,引诱罪犯露面。

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17岁的夏莉·费耶·史密斯被人杀害之后,种种迹象表明罪犯又把目标瞄准了夏莉

费耶·密斯漂亮的姐姐道恩。对此,我提出以道恩做诱饵的建议。在罪犯被拘留之前,每时每刻我都为我给司法部门及受害者家人提供的建议而提心吊胆,因为我明白一旦我的判断失误,史密斯一家便可能又一次面对难以承受的悲剧。

就在那位罪犯打电话给道恩,详细说明怎样在邻近的沙卢达县一处田野里找到史密斯尸体之后不到六星期,一等兵苏珊娜·柯林斯又被人杀死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公园里。

这样的案件实在太多了。

正如我的同事吉姆·赖特所描绘的,我们目睹的往往都是恶中之恶。每天都生活在人们对邪恶犯罪束手无策的境地之中。

“谁也说不清一个人究竟会对另一个人干出什么,”吉姆·赖特道,“一个人竟会对婴儿下手,对不满周岁的小孩下手,对女人剖心摘肺,做出丧心病狂的禽兽举动。没有哪一种方法能使我们所做的工作,像执法官员的工作或像暴力犯罪调查人员的工作那样,一点儿不受个人的影响。我们常常接到幸存的受害者打来的电话或是受害者亲人打来的电话,甚至连续杀人犯及强奸犯打来的电话。所以,我们是与这些罪犯个人打交道,只身卷入其中,为他们焦心劳肺。我想我们科的所有人员都有自己全身心投入进去而不愿罢手的案子。”

我明白吉姆·赖特所指的情况是什么,我接手过的格林河凶杀案(未曾破获)便是一例,另一例是至今仍时刻出现在我脑海中的苏珊娜·柯林斯被杀一案。

在家做恢复治疗期间,我参观过匡蒂科市的军人公墓

——那块如果我头一周就死了本会用来埋葬我的地方——浮想联翩,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还想活到退休年龄,我该怎么做。我一向自认为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但也意识到我已成为一个专注工作的人,往往一工作起来就忘记了一切:妻子、孩子、父母、家庭、朋友和邻居。现在已到了这一步:每当妻子和孩子受到伤害或出了问题,我都要把他们和我接触的那些恐怖案件中受害人的情况相比,以为我所付出的代价似乎不应该那么大。否则,我就会把他们伤口流的血同我在犯罪现场看到的受害人的血型进行分析与对比。我常常通过喝酒和大运动量的锻炼来消除经常出现的紧张感。当精疲力尽时,我才会感到轻松。

走出一座座公墓之后,我下决心要实实在在地为自己生活一回,更多地享受妻子帕姆、女儿艾里卡和劳伦对我的爱与支持(几年后,我的儿子杰德才出生);我开始信仰宗教,给自己多一些时间寻找生活中各方面的乐趣。我明白只有这样我才能从紧张中脱身出来。1990年,我由形象合成小组长晋升为调查支援科科长。我努力使每一位属下保持精神健康和感情平衡。我曾经历过种种案件,深知我们的工作是多么劳神费心。

干我们这一行,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要深入了解罪犯的心理,而且要深入了解受害人受害时的心理。那是你能够了解犯罪动机的唯一途径,也是了解受害人和罪犯之间所发生的真实情况的唯一途径。比如,你可能了解到受害人是一位性格很温和的人,既然如此,她为什么还是被罪犯打得鼻青脸肿呢?为什么仍受到如此残忍的折磨呢(据我们分析,她当时已经放弃了抵抗,完全照罪犯命令的做了)?

了解受害人当时怎么做的，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罪犯的重要情况。本案中，罪犯一定残暴地伤害过受害人。对他来说，强奸已经不够，惩罚她们才更为重要，这一点便反映出犯罪信号方面的特征，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出罪犯的其它性格特征，描绘出他以后的犯罪行为。

对每一件案子和每一位受害人，我们都应了解这一点，当然了，这也是最让人承受不了的。

警官和侦探要处理暴力犯罪的后果，这后果让人心神不安，但如果在这一行干久了，你也就习惯了。事实上，我们执法部门的许多人都担心，因为我们周围发生的暴力事件太多了，以至连公众都已熟视无睹了。

然而，我们所对付的罪犯不像武装抢劫犯那样以杀人为目的：他们杀人、强奸、折磨是因为他们喜欢，并且要从中获得满足，想拥有绝对权威和控制一切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在他们人格残缺不全的懦夫生涯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犯罪时享受到那么多的快感，以致于他们总想抓住每一次机会再次体验一下。加利福尼亚的劳伦斯·比特克和罗伊·诺里斯对他们的犯罪过程录了音，以便在他们那辆经过特别装备，绰号为“杀人者迈克”的大货车车厢里反复听到遭他们性折磨后又被杀害的青春少女的惨叫声。同样是在加利福尼亚，雷纳德·莱克及其同伙查尔斯·恩格制作了他们的绑架、折磨、摧残年轻姑娘全过程的录像带，并为其配了解说词以供事后欣赏。

我很想告诉你这只是极个别的案例，或者仅仅是加利福尼亚的几个狂徒的异常之举，然而，我实在目睹过太多此类的案子，我们的民众也实在目睹过太多此类案子，所以，

我不能那样对你说。看到或听到暴力案件的发生同我们处理的其它案件一样令人难以忍受。

多年以后，替科里评价或雇佣新人成了我的职责，我把对一位形象合成员的要求合成了一种形象：起初，我认为过硬的学历和扎实的心理、犯罪学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后来渐渐认识到比起经验和先天素质来，文凭和学院知识并不那么重要，在弗吉尼亚大学和部队病理学院，我们能够通过详细的课程学习，弥补教育方面的不足。

于是，我开始物色反应敏捷并且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候选人。通常，在联邦调查局和执法部门有许多非常适合工程或计算型人才做的工作，但是对于形象合成和调查分析来说，这类人员就不那么适合了。

与《沉默的羔羊》那类电影给人的印象相反，我们并不直接从学院挑选人进调查支援科。自从我们的第一本书《心灵追踪》出版之后，我收到过许多青年男女的来信，说他们想进入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参加在匡蒂科市的形象合成小组。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首先，你得被局里录用，其次，你得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这一领域一流的有创造性的调查人员，然后，我们才会招你进匡蒂科市形象合成小组。接着，你得准备好接受整整两年紧张的专门训练。

一位好的形象合成人员首先要表现出在调查方面拥有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性，既要尊重和信任同行及执法官员，倾听他们的意见，又要敢于冒险，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乐于招收那些有主见并敢于说出来的人，那些能在小组里使自己有说服力并善于纠正错误调查方向的人。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他们必须既能独立工作，又能与小组成员

协同工作。

一旦某个人被选中,他就得像法律公司的年轻助手同高级搭档一道工作那样,同有经验的小组成员一道工作。如果一点儿经验都没有,我们会送他到纽约警察局,和那儿最好的杀人案侦探一道驾车办案;如果他需要做更多的死亡调查,我们有像华盛顿特区以前德高望重的法医詹姆斯·卢克那样的全国有名的咨询医生。在他们来匡蒂科市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已在形象合成工作中合作,同州政府、当地政府及行政司法官办公室建立起了牢固的合作关系。

做好一名形象合成员必备的关键素质是判断能力,一种主要基于本能而非对事情和数据分析的判断能力,这很难解释是为什么,但就像波特尔·斯图尔特法官谈到色情文学时所说的那样:见了就知道了。

1993年,在圣地亚哥,拉里·安克诺姆和我在审判克里奥菲斯·普林斯时作了证,奥菲斯·普林斯在9个月里连续杀害了6位年轻姑娘。那件案子我们将在下一章里作详细叙述。在预审裁决我们所作的证明是否可靠时,一位辩护律师问我在界定犯罪的特征方面是否有一个客观的数字范围,换句话说,就是我能不能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提供一个确切的数据。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各种的因素涌现在我们的评判范围之内,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判断是以个人分析而非客观数据或测验为依据的。

同样的,发生了德克萨斯州韦科市布朗奇·戴维丁大院里的那场悲剧之后,联邦执法机构内部对什么能做和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沉痛的自我检讨。在华盛顿司

法部的一次会议之后，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叫我们科的人制定一个对付意外事件的系列方案，并且计算出每个方案的成功率。

珍妮特·雷诺部长是位极其聪明和敏感的人。我十分赞赏她为以后的突发事件作好提前准备意识，未雨绸缪，不过，我告诉她因为突发事件很有可能被视为不服从事件，所以我很不愿意做这件事。

“如果我告诉你某种对策在某个扣押人质的特殊案件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成功把握，而在别的案件中却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三十的成功把握，”我解释道，“那么，你得承担巨大的压力去获取那最高的百分率，然而，在此种情况下，我或者另一位分析人士却可能发现某些迹象暗示我们百分率低的选择才是该选用的方案。我们不能以精确的统计数据证明这一点，但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它才是最佳的方案。如果你总喜欢跟着数据走，那你就让一台机器去作决定好了。”

实际上，这是涉及我们这一行某个法律性的问题：机器能不能干我们干的工作？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要经历了足够的案件、有了足够的经验之后，由专家编制好一种程序，计算机就可以复制我作为形象合成员的思维过程。这条路子并非没有试过，但至少到现在，机器还不能像计算机写书那样做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即便是我们为它提供了词典中的所有词汇、口语中的相关用法、所有的语法规则、文体风格参数和最佳故事模型。在我们的工作中会遇到太多需要人做出独立判断的情况，太多需要凭训练、经验和直觉的情况，太多涉及人性中最精细微妙的情况。我们当然可

以而且也的确正在使用计算机数据记录来确定物质数量并有效地再次获取它们。然而,就像对于一名作诊断的医生那样,客观检测只在一定范围有用。既然机器不能承担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我们就只好使用能够平衡客观性和主观直觉的人了。

尽管我们可以提供技术并使这些技术精益求精,但我们却不能提供天才。这就像具有天赋的职业运动员身上的情况一样,天赋是与生俱来而不可强求的。就像表演、写作、玩乐器或打棒球,你可以教一个人相关的知识,指明其要点,帮助他提高技术,然而,除非你天生具有我朋友、小说家查尔斯·迈克加里所称的“高级眼光”,否则,你就不能在重大的高级比赛中连续击中来球,你不可能成为职业选手。

但是,如果你不是我们这个领域的职业选手,而是一位体面的正常人(我希望我们都是),你就不会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东西,也不会像我们这样卷入不同的家庭和幸存者之中,你就不会遇见多次强奸杀人以伤害他人为快乐的罪犯,不用承担使命,没有要发展同犯罪受害者及其家人保持密切关系的使命感。所以,你或许不知道如何进入我的工作领域,进入本书写作的视角。我愿罪犯能够悔改,也希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悔改,然而,以我做了25年联邦调查局特工和行为合成及犯罪分析员的经历来看,即使看见证据、统计资料和数字记录,我也不能相信我所希望的比我所知道的更具有真实性。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告诉你我对给予一个有目的的被判有罪的强奸杀人犯改过自新机会之类的事不感兴趣,我更关心如何使一位天真无邪而又可能受害的人从一开始便具备警惕性,防止受害。

请别误会,我们并不需要法西斯主义者或强权警察来完成这一切,我们也不想威胁宪法或民众的自由。依我的经历,我和任何人一样憎恶警察势力。我坚信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加强我们现有的法律,对审判、惩罚及假释等问题具备一些基以现实为基础而非感情的简单常识。我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最需要的是一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责任感。但依我的所见所闻,现在人们已不再具有责任心,对此总有一些人以个人生活因素或者社会背景因素来找借口。生活过程是有代价的,无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过去曾发生过什么,我们都必须对我们现在的行为负责。

简要地说出这些观点之后,请允许我一开始便重申任何执法人员都会说的话:如果期望我们来解决社会问题,大家会非常失望。问题到我们这儿,往往已经太晚,损失早已发生。我常说许多杀人犯是后天产生而非天生的。如果有足够的自觉性或外人的阻止,他们多数是可以学好的,或者说至少可以使他们不必犯罪。如果他们不犯罪,我也不必用那么多的时间去处理那些犯罪后果。

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的?是什么使我们认为自己可以理解一个杀人犯为何以那种方式杀人,而我们又可以根据这些描绘出他的行为特征,即使我们并不认识他是谁?

我们认为我们知道杀人、强奸、放火、爆炸等罪犯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是首先从真正的专家——罪犯本人那儿获得供述的人。我的同事和我过去曾做的工作以及现在正在匡蒂科市所做的工作最初都是建立在对《特工罗伯特·雷斯勒》一书的研究的基础上的。70年代末,我深入监狱,广泛而深入地与各种杀人犯、强奸犯及暴力犯会

面,集中精力研究了好几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至今仍在进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伯尔吉斯的协助下,研究结果已编辑成册,以《性犯罪:形式与动机》为书名出版发行了)。

要有效地对付那些家伙,并从他们那儿获得你想要的东西,首先你需要作充分的准备,研究全部案卷,洞悉整个案子,然后,深入下去,同他们面对面地打交道;如果你没弄清楚他们干了什么,怎么干的,他们是怎样发现受害人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伤害和杀死了她们,那么,他们便会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对你胡说八道。记住:多数连续杀人犯都是能左右他人的高手。如果你不愿意深入到他们当中,用他们的眼光看问题,他们也就不会对你吐露实情。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你工作的紧张感。

理查德·斯贝克在南芝加哥市的住宅里接连杀害了8位实习护士。我是在伊利诺斯州乔利埃特市的监狱里同他见面的。然而,在我以联邦调查局特派官员的身份、以粗暴的口气训斥他夺走了我们身边8位“傻瓜”的生命时,我从他那儿什么也没得到。也是在那时,他才把头转向我们,说:“你们这些混账家伙全都疯了,一定有什么东西让我们根本不能互相了解。”

与我调查受害人及其亲属的情形相比,我感觉这家伙一定很难对付,很难想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然而,我又必须对付他。同他直接接触之后,我才能够透过他强壮的外表,看清楚他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是什么使他在1966年的那个晚上从一名普通的盗窃犯变成为一名强奸杀人的凶犯。